

在华外国留学生汉语交际焦虑的实证研究

俞玮奇*

[摘要] 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焦虑是关注的焦点之一,但目前对交际过程中焦虑感的研究为数不多。本文调查了105名在华外国留学生在汉语交际时的焦虑感。调查发现交际对象和交际场合、留学生的语言能力、性格以及在华时间都对留学生的交际焦虑具有显著影响,性别和年龄对交际焦虑不具有明显的影响。根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软件 AMOS 建立起来的汉语交际意愿模型,发现汉语交际焦虑对留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汉语交际意愿、汉语交际频率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建议 and 对策。

[关键词] 交际焦虑;外国留学生;结构方程模型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vestigating relations among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and related variabl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using the WTC model as a framework. A Chinese communica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and tested using AMOS version 16.0, with a sample of 105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setting, participa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the stay in China ar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affect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The age and gender of foreign students don't affect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In the model, self-perceived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both influence WTC in Chinese. WTC and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both affect the frequency of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Accordingly, some suggestions and comments related to the issues are provided.

[Keywords]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SEM

一、引言

自第二语言教学的重心由教师转向学习者之后,学习者的情感因素对第二语言学习的

* 作者简介:俞玮奇,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对外汉语教学专业0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和社会语言学。

影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语言焦虑被认为是影响第二语言学习者情感因素中的主要因素。第二语言习得中的焦虑研究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就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1986 年 Horwiz 等提出了“外语焦虑(foreign language)”的概念,并将外语焦虑定义为语言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与课堂语言学习有关的自我认识、看法、情感以及行为;指出外语课堂焦虑包括三个部分:交际焦虑(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测试焦虑(test anxiety)及负面评价恐惧(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并发表了“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LCAS)”(杨连瑞等,2007:180)。国内不少研究者(如钱旭菁,1999;张莉、王飏,2002;张日昇、袁莉敏,2004;刘梅华、沈明波,2004 等)大多采用 FLCAS 量表对第二语言课堂的焦虑进行研究。由于外语课堂焦虑量表中对交际焦虑方面的调查仅限于课堂环境,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在现实交际环境中的交际焦虑感国内目前还没有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国外的交际意愿(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ion)研究领域已经开始关注现实交际环境中的交际焦虑。国外在对交际焦虑调查时多采用 McCroskey, Richmond, & McCroskey(1987)设计的交际焦虑量表(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Scale),该量表是让被调查者在 0%~100%之间评估自己在 12 类日常交际场合下交际时的焦虑程度。MacIntyre 和 Charos(1996)以交际意愿模型和 Gardner 的社会教育模型为基础,调查发现交际焦虑直接对二语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和二语交际意愿产生负效应,而学习者性格的外向性则会降低焦虑程度;Hashimoto(2002)对日本大学生和研究生英语交际焦虑的调查,发现交际焦虑对自我效能感具有负效应,而对交际意愿具有较弱的促进作用;Donovan 和 MacIntyre(2004)调查初中、高中、大学三组学生发现不同年龄和性别组之间的交际焦虑存在显著差异,交际焦虑和自我效能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受年龄和性别因素的影响,女生的交际焦虑程度对交际意愿具有预示性。

目前国外外语教学界在交际焦虑方面已有大量的调查研究,而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的研究仍比较薄弱。在中国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人数众多,该群体由于远离本国,直接处于目的语环境中,其在实际的汉语交际环境中的焦虑程度如何?哪些因素影响留学生的汉语交际焦虑程度,汉语交际焦虑对交际有哪些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调查研究,用定量统计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外国留学生在目的语环境中交际的焦虑感进行考察和分析。

二、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主要以在南京大学和南京中医药大学进修汉语的外国留学生为主要调查对象,调查共收到 116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105 份,有效率 90.5%。其中欧美国家(含澳大利亚)的学生 50 人,韩国 47 人,日本 2 人,巴西 2 人,印尼、蒙古、泰国各 1 人;男性 44 人,女性 61 人;年龄主要分布在 20~25 岁年龄段,年龄最小的为 14 岁,最大的 49 岁,平均年龄 24.2 岁,平均来华时间 7.2 个月。

2. 调查工具

研究主要采用的测量工具是以 Donovan & MacIntyre(2005)的交际焦虑量表(Com-

munication Apprehension Scale, $\alpha=0.910$)为蓝本,根据汉语学习者的实际情况修改而成。汉语交际焦虑量表共 12 项题,是让被调查者评估自己在不同日常交际场合与不同交际对象交流使用汉语时自我感知的焦虑程度。

本次问卷调查还采用了 Donovan & MacIntyre(2005)的交际意愿量表(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Scale, $\alpha=0.947$)、自我效能感量表(Self-Perceived Competence Scale, $\alpha=0.964$)、Macintyre & Charos(1996)的交际频率量表($\alpha=0.865$)、Oxford(1993)所用量表中的性格测量部分($\alpha=0.893$)等。以上各量表均根据汉语实际情况修改,采用克伦巴赫阿尔法(Cronbach's alpha)系数进行信度评估,显示均具有较高信度(见 α 值)。

3. 数据搜集及分析方法

2008 年底至 2009 年初在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10 多个班级课间发放调查问卷。数据经录入、校验后,采用社会统计分析软件 SPSS16.0 和结构方程模型软件 Amos16.0 进行分析。

三、影响汉语交际焦虑感的因素

1. 交际对象和交际场合的影响

通常认为交际的参与者、场景、话题和角色关系是影响言语交际的主要因素(游汝杰等, 2009:86)。调查结果(表 1)显示,汉语交际的对象和交际场合对外国留学生汉语交际时的焦虑程度具有显著的影响,交际对象熟悉程度越低,交际场合越正式,留学生的交际焦虑程度越高。因此,在正式场合交际时最好能注重营造宽松的氛围,以减轻留学生使用汉语交际时的焦虑感。

表 1 汉语交际焦虑在不同交际对象和不同交际环境下的差异比较

交际焦虑	M	SD	F	Post Hoc Tests(LSD)	MD
不同交际对象:			53.197*		
与朋友	31.27	22.59		与朋友<与认识的人	-9.41*
与认识的人	40.68	23.81		与朋友<与陌生人	-33.21*
与陌生人	64.48	24.31		与认识的人<与陌生人	-23.79*
不同交际环境:			26.975*		
两人场合	32.90	20.76		两人场合<多人场合	-5.21
多人场合	38.10	22.48		两人场合<会议场合	-18.15*
会议场合	51.04	25.99		两人场合<公开场合	-26.94*
公共场合	59.84	25.36		多人场合<会议场合	-12.94*
				多人场合<公共场合	-21.74*
				会议场合<公共场合	-8.79*

* $p<0.05$

2. 性别和年龄因素

从交际焦虑均值来看,女性的交际焦虑程度要高于男性,但 t 检验显示(见表2),留学生汉语交际时的焦虑感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 = -0.1.696, p > 0.05$)。又根据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将留学生分为3个年龄组,方差分析显示(见表3),不同年龄组之间的交际焦虑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次研究表明性别和年龄因素对汉语学习者的交际焦虑不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与 Donovan 和 MacIntyre(2004)调查发现不同年龄组、性别对交际焦虑有显著影响的结果明显不同。

表2 汉语交际焦虑感在不同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男($n=43$)		女($n=58$)		MD	t ($df=99$)	P
	M	SD	M	SD			
汉语交际焦虑感	41.50	20.75	48.42	19.99	-0.693	-1.696	0.093

* $p < 0.05$

表3 汉语交际焦虑感在不同年龄段上的差异比较

	≤ 20 岁 ($n=21$)		21~24岁 ($n=49$)		≥ 25 岁 ($n=29$)		F ($df=2, 96$)	P
	M	SD	M	SD	M	SD		
汉语交际焦虑感	43.20	23.64	47.17	17.09	43.96	20.26	0.412	0.664

* $p < 0.05$

3. 性格因素

关于性格对交际焦虑的影响效应,我们考察性格外向性指数与汉语交际焦虑之间的关系,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Pearson Correlation, $n=89, r = -0.209, p = 0.049 < 0.05$),性格外向性指数与交际焦虑存在显著的低程度相关。这表明性格外向的留学生在汉语交际时的焦虑感会弱一些,而性格内向的留学生的汉语交际焦虑感较强;但调查显示两者的相关度较低,因此性格并不是影响汉语交际时焦虑感的最主要因素。这一结果与 MacIntyre 和 Charos(1996)的调查结果很相似,即性格外向性的学习者在二语交际时更自信,交际焦虑感较弱。

4. 语言水平的影响

关于汉语水平对留学生汉语交际时焦虑感的影响,我们以来自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长期进修班的72名留学生作为分析对象,该部分留学生入学时接受了统一的汉语考试,并根据考试结果被分入A~D不同级别的班级,分班结果基本上反映了留学生实际的汉语水平,据此我们对留学生进行了分组。

表4列出了不同汉语水平的留学生的汉语交际焦虑感均值,数据显示随着汉语能力的增强,留学生在汉语交际时的焦虑感在不断地减弱。方差分析显示,不同汉语水平的学习者之间的交际焦虑感存在显著差异($F = 3.97, p < 0.05$)。Post Hoc Tests 进一步显示,零基

础的学习者与高级班的学习者在汉语交际时的焦虑感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汉语水平低的学生在交际过程中常常会达不到预期的交际目标,经常遇到交际障碍,这就使其自尊心和自信心受挫,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从而形成较强的交际焦虑感。这与钱旭菁(1999)的调查结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其焦虑平均值并没有显著差异”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是由于钱旭菁采用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LCAS)调查的是课堂焦虑感,而在实际的日常汉语交际过程中,不同汉语水平的留学生的交际焦虑感会存在着明显的程度差异,这也印证了MacIntyre和Gardner的观点:“随着学习经历的增加和水平的提高,学习者的焦虑感会有所减弱”(Aida,1994)。

表4 汉语交际焦虑在不同汉语能力的学习者上的差异比较

零基础 D 班 (n=13)		初中级 C 班 (n=24)		中高级 B 班 (n=13)		高级 A 班 (n=22)		F (df=3, 67)	Post Hoc Tests (Scheffe)	MD
M	SD	M	SD	M	SD	M	SD			
60.07	18.82	49.51	17.57	40.55	16.69	38.27	23.25	3.97*	D>C	10.57
									D>B	19.52
									D>A	21.81*
									C>B	8.96
									C>A	11.23
									B>A	2.28

* $p<0.05$

5. 在华时间因素

调查显示,留学生在华时间的长短对汉语交际焦虑程度具有显著的影响。留学生在华时间越长,汉语交际过程中的焦虑感均值越低,方差分析显示,不同组之间的交际焦虑程度具有显著性差异,Post Hoc Tests 进一步显示,在华时间 3 个月以下的学习者和在华半年以上的学习者之间的汉语交际焦虑程度差异存在显著性。这说明,随着在华时间的增多,对目的语环境和汉语交际的熟悉程度加深,留学生在实际的日常汉语交际过程中的焦虑程度会明显地减弱。

表5 汉语交际焦虑在不同在华时间的学习者上的差异比较

第 1 组 0~3 个月 (n=56)		第 2 组 4~6 个月 (n=19)		第 3 组 6 个月以上 (n=22)		F (df=2, 96)	Post Hoc Tests (Scheffe)	MD
M	SD	M	SD	M	SD			
49.37	19.94	46.62	23.22	36.50	17.81	3.458*	第 1 组>第 2 组	2.74
							第 1 组>第 3 组	12.86*
							第 2 组>第 3 组	10.12

* $p<0.05$

四、交际焦虑对汉语交际的影响

通常认为语言学习焦虑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外语课堂学习效果(杨连瑞等,2007:182),至于汉语交际焦虑会对留学生实际的汉语交际过程产生何种影响,本文以 MacIntyre(1994)的交际意愿模型为基础,就留学生的汉语交际焦虑对汉语交际意愿、汉语交际频率以及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加以研究。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 Amos16.0 建立适合在华外国留学生的汉语交际模型,该模型的建立是以 MacIntyre(1994)、Hashimoto(2002)等人的交际意愿模型为基础,再根据初步分析得出的修饰指数进行修改。在增加汉语交际焦虑到汉语交际频率的路径以后,修正模型的拟合检验指数(CMIN/DF=1.206, $p=0.272>0.05$, RFI=0.912, IFI=0.998, TLI=0.984, CFI=0.998, RMSEA=0.044)显示模型拟合良好, $p>0.05$ 未达到 0.05 的显著水平,拒绝虚无假设,表明理论模型与样本数据间可以适配。具体构建的汉语交际路径模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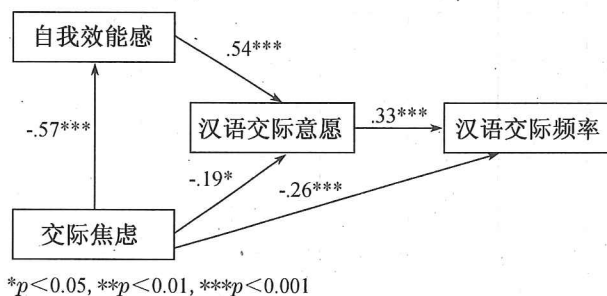


图1 在华外国留学生汉语交际的路径分析模型

表6是对图1中汉语交际焦虑影响效应的解读。留学生在汉语交际过程中产生的焦虑会对汉语交际意愿、汉语交际频率以及自我效能感产生明显的负效应。图1显示了汉语交际焦虑的三条影响路径:第一,汉语交际焦虑会直接影响留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也就是自我觉察的交际能力),直接降低汉语交际时的自信,这将间接导致留学生的汉语交际意愿减弱,最终又将影响实际的汉语交际频率;第二,汉语交际焦虑也会直接降低留学生的汉语交际意愿,这又将间接导致留学生汉语交际频率的降低;第三,模型显示交际焦虑会对留学生的汉语交际频率产生直接的负效应,将直接导致留学生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频率减少。

与国外交际意愿模型的不同在于,该模型中汉语交际焦虑会对汉语交际频率产生直接的负作用,即汉语交际过程中的焦虑感会直接导致留学生减少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频率,交际焦虑竟有如此强烈的直接效应,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在华外国留学生远离本国,直接处于不熟悉的目的语交际环境有关。

表6 汉语交际焦虑的影响效应

自变量	因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汉语交际焦虑	自我效能感	-0.57	—	-0.57
	汉语交际意愿	-0.19	-0.31	-0.50
	汉语交际频率	-0.26	-0.16	-0.42

五、结论与对策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 (1) 留学生在汉语交际过程中的交际对象和交际场合显著影响其交际焦虑程度。
- (2) 不同性别、年龄的留学生的汉语交际焦虑并没有显著差异。
- (3) 不同汉语水平的留学生在汉语交际时的焦虑程度具有显著差异,零基础阶段的汉语学习者的交际焦虑程度最高,高级水平的学习者汉语交际焦虑程度较弱。
- (4) 留学生在汉语交际时的焦虑程度与其性格存在低程度的相关性,性格外向性的学习者在汉语交际时的焦虑感较弱。
- (5) 留学生的交际焦虑对其汉语交际意愿、汉语交际频率以及自我效能感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既然交际焦虑对汉语交际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那么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去降低交际焦虑感,激发留学生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意愿,以增加汉语交际的频率。首先,调查显示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对其汉语交际焦虑具有明显的影响。留学生不远万里来中国学习汉语,通常有着学好汉语的强烈愿望,自然会对运用汉语进行交际产生高期望值,但有限的汉语能力在目的语环境中常常遇到大量的交际障碍,由此自信心会受挫,产生失败感和焦虑感,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关注低水平的汉语学习者,要善于启发和疏导,增强其汉语交际的自信心,在课堂中增加汉语交际的情景教学,让其尽快适应汉语交际环境。其次,调查显示出留学生在与熟悉的对象和两人场合汉语交际时,交际焦虑感较弱,因此应多创造学生之间用汉语交际的机会,鼓励留学生多与中国朋友交往,从弱交际焦虑环境出发,逐渐增加汉语交际的频率。另外还在可控的交际场合,如课堂等场合,注意营造轻松的交际氛围,以减轻留学生的交际焦虑情绪。第三,调查显示留学生的在华时间的长短对其汉语交际焦虑有显著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在华时间长的学习者对汉语环境和交际规则熟悉的缘故,因此对于初学者让其尽快熟悉汉语环境和交际规则是降低其汉语交际时焦虑感的捷径。最后,汉语教学过程中还要关注性格内向的学习者,多对他们鼓励和疏导,降低他们在汉语交际时的焦虑感。

以上研究表明,在华外国留学生的汉语交际焦虑感与国外研究相比,既有共通之处也有自身特殊的一面,具有独特的价值。本文的研究是探索性的,调查方法主要基于问卷,问卷调查样本有限,期待以后的研究能扩大调查样本量,采用访谈等多种调查方法,并控制被试的文化差异等干扰,必然会有更为深入的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 [1] 范祖奎. 汉语阅读焦虑源的国别差异分析. 汉语学习, 2009(3)
- [2] 刘梅华, 沈明波. 外语课堂中的焦虑研究.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1)
- [3] 钱旭菁. 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时的焦虑.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9(2)
- [4] 杨连瑞, 张德禄. 二语习得研究与中国外语教学.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5] 游汝杰, 邹嘉彦. 社会语言学教程. 第二版.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 [6] 张莉. 留学生汉语阅读焦虑感研究. 语言文字应用, 2002(4)

- [7] 张莉,王飏. 留学生汉语焦虑感与成绩相关分析及教学对策.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2(1)
- [8] 张日昇,袁莉敏. 大学生外语焦虑、自我效能感与外语成绩关系的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4(3)
- [9] Aide, Y. Examination of Horwitz, Howitz, and Cope's Construct of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The Case of Students of Japanese.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94, 78(2)
- [10] Donovan, L. A., Macintyre, P. D. Age and sex differences in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and self-perceived compet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2005, 21, 420 - 427
- [11] Hashimoto Y. Motiv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s predictors of reported L2 use: The Japanese ESL context. *Second Language Studies*, 2002, 20(2), 29 - 70
- [12] MacIntyre, P. D. Variables underlying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 causal analysi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1994, 11, 135 - 142
- [13] MacIntyre, P. D., & Charos, C. Personality, attitudes, and affect as predictors of second language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15, 3 - 26
- [14] McCroskey, J. C., Richmond, V. P., & McCroskey, L. L. *Correlated of self-perceived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Montreal, 1987
- [15] Oxford, R. L. Evidence and instructional implicational of gender difference in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styles and strategies. *Applied Language Learning*, 1993, 4(1 - 2), 65 - 94